

金代孔庙的修建及其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

张 敏 杰

内容提要 终金一代,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女真统治者,曾经对各地孔庙,尤其是曲阜孔庙进行了大规模新建、重建、扩建和修葺,不仅光大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承了民族文化,而且也加速了金代女真族的封建化过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关键词 金代 孔庙 儒学 民族融合

由孔子创立的儒学是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思想文化领域也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孔庙作为儒学的象征、传播的载体,在两千年来的历史长河中,对于光大儒家思想、发展教育事业、传承民族文化皆发挥了重要作用。终金一代,特别是从太宗至章宗的盛金时代,对各地孔庙,尤其是曲阜孔庙进行了大规模新建、重建、扩建和修葺,不仅发挥了上述作用,而且对于加速民族融合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金代对儒学的崇尚朝重一朝,孔庙的修建规模与朝俱增

(一)太宗朝宗亲渠帅止掘孔子莹,修复孔庙拉开序幕

金朝建国之初,尚属奴隶制国家的初级阶段,这就注定了它对宋朝的战争是一种劫掠性的战争。广袤的中原大地,金兵所及之处,“庐舍为之灰烬,原野厌乎流血,沟壑填于残骸。”^①各地的孔庙大多没有逃脱兵燹之灾,甚至连名闻遐迩的曲阜孔庙也遭到严重的破坏。但也应该看到,对孔庙的焚扰,只是一些尚在冥顽的金兵的野蛮行为,而绝非战争指挥者的本来意愿。否则就不会有孔墓得以幸免破坏的结果。“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金粘没喝(完颜宗翰)陷袭庆府,兵至阙里,军士欲发孔子墓,粘没喝问通士高庆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圣人’,粘没喝曰:‘大圣人墓安可发’得军士发泗水侯及刑部侍郎宗翰墓者二十人,悉斩之。”^②这一历史事件在《松漠纪闻》续集中也有记叙:“初,汉儿至曲阜,方发宣圣陵,粘罕闻之,问高庆绪(渤海人)。曰:‘孔子何人?’对曰:‘古之大圣人。’曰:‘大圣人墓岂可发?’皆杀之,故阙里得全。”《松漠纪闻》是南宋人洪皓对羁留金地时见闻的追记。洪皓于建炎三年(1129年)持节使金,被金朝统治者拘囿,在金辗转流徙十五年,其间与粘罕曾有过直接接触。该纪闻为历代金史专家所倚重。孔子墓被粘罕保护这一经过足可确信。这里的粘罕即粘没喝的同名异音译,汉名完颜宗翰,是金太祖阿骨打与太宗吴乞买的从侄,时任伐宋西路军的最高统帅。由此可见,孔子墓能够得以保存,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一方面,这是金初上层人士对圣人的崇敬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孔子的圣人的光环保护了自己的陵寝免遭祸害。

如果说宗翰的这一行动只是出于对一般意义上的圣人的景仰,那么另一位领军之帅阿骨打的儿子完颜宗尧的行为则应被看作是已初步认识了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的伟大,而由衷地敬佩,并且已开始了学习和借重儒家学说为金朝统治阶级服务的实践活动。

“天会五年(1127年),金将完颜宗尧进驻燕京,戎马未息,首建太学,修国子监。天会七年(1129年)兵临曲阜,命曲阜知县‘引诣圣庙’,‘登杏坛,望殿火奠拜’”。^③

金朝的两位宗室皇亲、开国元戎相继止掘孔子墓,进而对孔子顶礼膜拜,虽然仅是隆金一代大规模修复、新建孔庙,尊孔崇儒的一支序曲,但是孔子及其创建的儒学的感召力、同化力抑或征服力在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地位已充分显现出来。正如后来金熙宗所说:“孔子虽无位,以其道可尊,使万世高仰如此。”^④正因如此,在金宋两国对中原的争夺战争尚未结束,孔庙的修复活动即已开始。迄至划淮而治,就于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修冀州(今河北冀县)孔庙;天会十二年(1134年)修大城县(今河北大城县)孔庙和彰德县(今河南安阳市)孔庙。

(二)熙宗、海陵、世宗期首建上京孔庙,修复孔庙渐成规模

金代在京师建孔庙以及首次由皇帝敕命,政府拨款修复曲阜孔庙发端于金熙宗时代。“天会十五年,齐国废。熙宗即位,兴制度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⑤近由史家考证,“孔庙位置在金上京南城内,皇城外的东南角处(现阿什河乡南村五组居民区一带)。”^⑥随之,金熙宗于天眷三年(1140年)秋“以孔子四十九代孙(孔)袭封衍圣公”并于次年(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⑦紧接着于皇统二年“敕行台拨钱一万四千贯,修孔庙圣殿,皇统四年又命‘行省降钱一万四千五百贯,发南京入作司见材,修完孔庙,创盖大成殿’。至皇统九年,大成殿竣工。”也就是说,从熙宗即位改元伊始,至皇统九年(1149年)被杀,在位十四年中,由皇帝亲自过问的修建孔庙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地方上于天眷三年(1140年)修兖州(今山东兖州)孔庙;皇统元年(1141年)修曲沃县(今山西省曲沃县)孔庙;皇统年间(1141至1148年)修渔阳县(今天津市蓟县)孔庙。

海陵王完颜亮在完成迁都和改革官制的同时,“命天下州县许破系省钱,修盖文宣王庙”,^⑧在曲阜孔庙于“正隆二年(1157年),又以羨钱修两庑及齐国公殿”。^⑨地方上也在正隆元年(1156年),修威县(今河北省威县)孔庙;正隆二年(1157年),修京兆府(今陕西省西安市)孔庙。

金世宗在位时期,可以说是“金源文化”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原文化”融合的完成时期。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金世宗“以尚书右丞张汝弼摄太尉,致祭于至圣文宣王庙。”^⑩以致于当时文士党怀英在《重建郭夫人殿记》中颂扬他“大定间,天子留意儒术,建学养士以风四方。举遗礼,兴废坠,旷然欲以文治太平。”正是由于金世宗的提倡,不仅于大定十九年(1179年)在曲阜孔庙重建了郭国夫人殿(宋大中祥符元年追封孔子夫人元官氏为郭国夫人,天禧年间修庙时增大寝像),还从大定三年(1163年)至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重建、新建、修复平遥县(今山西平遥县),汾州(今山西吉县),清河县(今河北清河县),新乡县(今河南新乡市),文登县(今山东文登县),章丘县(今山东章丘县),博州(今山东聊城市),泰安州(今山东泰安市),济阳县(今山东济阳县),曲周县(今河北曲周县),涿州(今河北涿州市),夏邑县(今山西西夏县),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忻州(今山西忻州市),潞州(今山西长治市)等孔庙十五座。

(三)章宗时孔庙修建规模进一步扩大,孔庙规格达到空前的极致

金代章宗时期,封建制度已臻完善,民族文化的融合已趋完成,金统治下的北部中国已是“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⑪章宗顺时应势,实行了一系列维护巩固的措施。在修复曲阜孔庙上超过了他的几位祖辈皇帝,创当时历史之最。他在登极伊始,即明昌元年(1190年):“诏修曲阜孔子庙学。”^⑫第二年,又“诏诸郡邑文宣王庙,风雨师,社稷神坛坠废者,复之。”^⑬“明昌二年(1191年)拨款76400多缗大修孔庙。此次大修,‘三分其役,因旧以完葺者据其一,而增创者倍之。’前后历时四年,至明昌五年(1194年)告竣。孔庙扩展到‘殿堂廊

庀门亭斋厨 簠舍合三百六十余楹的规模,‘位叙有次,像没有仪表以杰阁,周以崇垣’,‘制度大备于历朝’。^⑥这次孔庙的扩建,不仅是在建筑物数量上扩大了三倍,更主要的是在建筑规模上作了突破性的提高:在专为纪念孔子讲学施教的杏坛上建起了似十字脊、四面歇山的亭子,“始用琉璃瓦,殿庀均以琉璃瓦剪边,青绿彩画,朱漆栏槛帘栊,檐柱也改为石柱,并刻龙为饰”,同时在泮“桥后石栏之东,紧接庙墙立有一通石碑,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习称下马碑”。^⑦这就第一次把孔庙的建筑制式与皇宫等同了起来。与此同时在庙门前新建了“棂星门”,按照“灵星即天田星,汉高祖祭天祈年,命祀天田星”等说法,灵星门的建造,象征着祭孔如同尊天。

在拨库银修了曲阜孔庙之后,章宗又先后于明昌六年(1195年)“问辅臣:‘孔子庙诸处何如?’”于泰和四年(1204年)“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⑧由此,章宗一朝在地方上从明昌二年(1191年)至泰和八年(1208年)修建了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应州(今山西应县),棣州(今山东惠民县),许州(今河南许昌市),长子县(今山西长子县),鸡泽县(今河北永平县东南),绥德州(今陕西绥德县),保德州(今山西保德县),万全县(今河北万全县),肥乡县(今河北肥乡县),邺县(今河南邺县)等十一座孔庙。

金章宗之后至金末二十多年里,虽帝位迭替,战事频仍,但仰仗前朝几位皇帝尊孔政策的余温,仍修复过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的孔庙近十座。

终金一代,儒学朝重一朝,孔庙修建规模与朝俱增,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儒学最适用于对多民族国家的封建统治;最受知识分子阶层崇拜以及它那移风易俗的神奇力量,在民族文化大融合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地位。

二、孔庙修建与民族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一)建庙扩大了儒学涵盖地域,儒学濡染了新的民族

在中国古代,庙,这种特定建筑物,无疑成为了某种宗教和学说传承的最好载体。纵观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等,无论是源于中国,还是传于国外,都从其庙(教堂)的建置范围与规制上推断出它的肇始、存在、兴盛抑或没落。金代几朝统治者在孔庙这一儒学载体的修建上开创了当时的几个历史之最,也就把儒学的传播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首先,由皇帝亲自颁治建孔庙,修孔庙,祭孔庙,标志着金朝统治者对儒学的认同、需要和崇敬,也就标志着儒学所教化的民族,从那时起又多了一个对于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少数民族——女真族。继而发展到把诸多儒家经典翻译成女真文字刊行出版,在京城建立女真大学,研究和运用儒学,使之在女真族中传承不息,发扬光大。

其次,金熙宗下诏建造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南郊),有迄今发现的中国封建时代地理位置最北的孔庙。姑且不与“孔子庙西行不到秦”时相比,就是与辽王朝建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孔庙相比,又将中华大地上儒学所涵盖的区域向东北拓展了一千多里。

再次,由金章宗下特旨,拨专款扩建的曲阜孔庙“即旧以新,增其十八”,始用琉璃瓦、刻蟠龙柱,更立墙外下马石,红墙绿瓦、石柱朱棂,“崇焉有制,宏焉唯法”,“植植其正,翼翼其严”,俨然一座皇家庭院,使当时鲁及四方士人瞻仰之间叹为观止,大发“唯今非昔”之慨。^⑨这就使孔庙由春秋时“家庙”升至东汉时“国庙”,至金时再一步跃迁为“帝庙”。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儒学在诸多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唯“儒”独尊的地位。也为继之而来的蒙古和满清树立了楷模,使之一俟入主中原,率先建庙祭师,以“尊孔崇儒”为基本国策。

(二)建庙增强了君权至上的观念,儒学加速了金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化进程

金熙宗不但是金代第一个建孔子庙的皇帝,也是第一个亲祭孔子的皇帝,从某种意义

上说,他还是金代第一个真正光大儒学的皇帝。熙宗自幼饱读经书,深得儒学要旨。登基之初,即“兴制度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按照孔子“天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⑧的圣训。熙宗上述行动的本身就等于昭示天下,自己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天子,是有道的明君,今后就必须按照新的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必须严格地实行“君为臣纲”。还应提及的是主祭人由谁担任的问题也属于礼的范畴。远在春秋,就有献祭牺牲由盟主执牛耳的成例。后经演进,在中央集权的封建时代,祭天、祭祖、祭神,主祭人都是皇帝担任,至少必须由得到皇帝委派的宗亲、重臣担任。未受皇帝委托,私立祭祀的行为被称为僭越,历史上如此丢了身家性命的不乏其人。金熙宗深知这一点,当仁不让地主祭孔子,北面再拜。一方面表达了对孔子的崇敬,同时也向天下宣示了他的君权至上。他的继任者们也同样不是亲自释奠孔子,就是钦定祭孔释奠乐章和仪秩。章宗还特“定宣圣庙春秋释奠,……祝词称‘皇帝谨遣’……”。^⑨随着一系列新的礼制、官制的颁行,金代皇权得到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化过程得以迅速完成。

(三)建庙缓和了民族矛盾,儒学培养了一批封建统治人才

孔子是儒士心中的偶像,对孔子的祭拜是儒士精神寄托的表达,修建孔庙从思想感情上拉近了女真统治者同汉族儒士的关系。并且金初女真统治阶级对羁留金国的宋朝士人不是采取杀、关的办法,而是让他们西席设馆,教授贵族子弟,这就迎合了儒生“士可杀不可辱”和“士为知己者用”的心理。谁能想象整天一起切磋“仁者爱人”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师生还能心存互相杀伐的敌对情绪。从熙宗“天眷二年,诏求孔子后,加承奉郎,袭封衍圣公,奉祀事”^⑩开始,金朝时孔子四代嫡孙袭封衍圣公,并多次晋升品秩,世袭曲阜县令。对其他孔门后代在科举上也给予特殊照顾,甚至特赐进士及第。这些都进一步使汉族儒生认清了女真统治者是在真心实意地在推崇和学习儒学,从而缓和了民族矛盾,加速了两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

另一方面,从北朝开始的庙学合一的体例,经隋、唐至宋沿袭传承,渐成定制。从金章宗泰和四年“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⑪和现存重建于金大定三年的山西平遥文庙左右各有一学的形制来看,金代同样承袭了庙学合一的成例。那么,就不管金代是因庙立学还是因学设庙,结果是中原大批学校与孔庙的同时修复,为汉人子弟提供了更多的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机会。加之以儒学水平为考核标准的科举制度日臻完备,给汉人士子跻身仕途拓宽了道路。世宗大定年间开设了女真儒学学校和女真进士科,也为女真子弟系统学习儒学和由学儒而进仕的条件。因之出现了史称的“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举位至宰者接踵”^⑫的局面。这样,金以儒学为国学的结果,使一大批儒学造诣颇深的汉、女真、契丹族统治人才相继进入金代统治阶层,对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四)建庙提供了化民的场所,儒学促进了风俗的进化

儒学自孔子创建以来,其所倡导的纲常伦理,在调解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生活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金代女真统治者在学习和运用了儒学治国方略一面的同时,也把这些道德规范接受过来,做为教化子民的思想武器。世宗在即位之初,便下诏暴扬海陵王十七大罪状,其中主要的就是海陵杀掉政敌后,纳被杀人之妻为妃,其中有婣子、嫂子、侄媳等。其实按照当时女真人的习俗,这种收继婚并不构成罪名,“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则侄亦如之。”^⑬世宗指以为罪状,说明女真统治者已经开始接受了由儒家倡导的封建伦理观,已开始同本民族旧有的习俗决裂。承安五年(1200年)三月和泰和五年(1205年)六月,“定本国婚聘礼制”“制本国婚礼。”后来就有了褒扬贞节的行动。章宗在明昌三年(1192年)就曾“诏……赐同州贞妇师氏曰‘节’”。^⑭金代统治者在宣扬贞节的同时,

大肆鼓励孝悌,金史上有奖掖孝子的记载时有所见。对于不行孝悌的人,则是实行劝化的办法。例如大定二十二年的进士蒲察郑留在任顺义军节度使时:“西京人李安兄弟争财,府县不能决,按察司移郑留平理,月余不问。会释奠孔子庙,郑留乃引安兄弟与诸生叙齿,列坐会酒,陈说古之友悌数事,安兄弟感悟,谢曰:‘节使父母也,誓不复争。’乃相让而归”。^⑥从这段记载,我们既可以看到孔庙作为“化民”的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不难看出儒学在金代后期传播得已多么广泛,可谓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七。

②《阙里文献考》卷十一,林庙 1

③⑧⑩⑬《山东省志·孔子故里志》第 295-308页。

④《大金集礼》卷三十六,《宣圣庙》。

⑤⑭《金史·孔 传》。

⑥《大金国第一都》第 243页。

⑦《金史·熙宗本纪》。

⑨《金文最·威县建庙学碑》。

⑪《金史·世宗本纪》。

⑫《归潜志》卷十二。

⑬⑯⑰⑱⑲⑳《金史·章宗本纪》。

㉑党怀英《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

㉒《曲阜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铭文。

㉓《论语·季氏》。

㉔《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女真传》。

㉕《金史》卷一百二十八。

(作者: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副研究员 哈尔滨 150001)

责任编辑:北 辰

(上接第 73页)

①②⑬ S·P 亨廷顿:《西方文明:独特,但并不普遍》,

载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 6期。

③ Gilbert Rozma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82年版,第 9-13页。

④⑦ 冯·劳厄:《西化的世界革命》,载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 9期。

⑤ 卢卡维希尼科夫:《俄罗斯与其他后共产主义社会现代化的社会学问题》,载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 10期。

⑥ A·R 德赛:《重新评价“现代化”概念》,载于 S·P 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4页。

⑧ E. C. Pulleyblank, *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1955年版,第 36页。

⑨ L·S 斯诺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第 889页。L. S. Stavrianos, *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1年版,序言,第 3-4页。

⑩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世界史便览——公元前 9000年—公元 1975年的世界》,三联书店 1983年版,第 295页。

⑪ L. S. Stavrianos, *The World to 1500 A Global Histor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0年版,第 3页。

⑫ L. S. Stavrianos, *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1年版,目录,第 1-6页。

⑬ L. S. Stavrianos, *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1年版,序言,第 4-5页。

⑭ 马克思:《资本论》第 1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一版序言,第 8页。

⑮ S·P 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年版,第 43页。

(作者: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哈尔滨 150080)

责任编辑:北 辰